文艺不只是社会的装饰品

□毛志成

我这里说的“不只是”，包括“可以是”的意思。也就是说，文艺（一称“文化艺术”，一称“文学艺术”）可以是社会的装饰品（包括点缀品、包装品），正如同缺乏装饰、缺乏点缀或缺乏包装的建筑物，毕竟是粗糙的，是俗陋的。

但是如果文艺变成了装饰品、点缀品后，失去了实际功能，尤其是这样的装饰品、点缀品太超量，太过剩，也只能说明社会的日趋浮躁化，致使多余而无用之物的泛滥。这样的东西积得多了，又绝不会是静止的，它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价值”又注定要使其中的良性因素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恶性因素。

我看文艺的头一个危机，就是各式装饰品、点缀品、包装品的比重太大，超过了各种具有真切功能的实体。比如很多文化机构往往为搞活动而搞活动，为开会而开会，为写“业绩报告”而写“业绩报告”。说到作家、诗人、艺人本身，也有个装饰过头的问题。他们借用的装饰之物也很多，有的借用或古或洋的作秀式学问，有的借用或实或虚的作假式笔墨，有的借用或俗或怪的作态式耍闹。上述的人，有时已经将哗众效应视为第一价值，将各式亢奋剂当成主要的药物或精神食品。不少的文人、艺人已经将写作、演出只当成才艺表演场或名利竞争场。而对精神的首要主旨即对德育功能的强化，则越来越淡然处之了。诚然，任何健全的社会机件都不拒绝装饰品、点缀品、包装品的使用。但是那些东西若是喧宾夺主，若是四下充斥，致使文艺本身的精神硬件松散化或是疲弱化，终归不是值得大夸大赞的。

当前作为装饰品的文艺，就性质上说有三种：有益的、无害的、有害的。因此我们的态度也应当是：尊重有益的，允许无害的，反对有害的。

什么是有益的装饰品？主要指：无论是文艺团体、文艺机构，还是文人、艺人本身，虽然没有经邦济世、治国理政的大能量，很多时候只是社会的帮闲，但至少仍有基本的精神追求、道义恪守。也就是说，立足于使社会日趋真化、善化、美化，绝不做假恶丑事物的推波助澜者、煽风点火者、播土扬尘者。

什么是无害的装饰品？主要指：虽然某些文艺作品、文艺活动只是为了消闲解闷，增加自己和世人的愉悦感、兴奋感，但所做的事毕竟有文化含量，有文明品位，不低俗、不污浊。总之，即使所追求的快感也属于良性快感，而不是恶性快感。

什么是有害的装饰品？头一条就是惟名惟利，不顾其他。有时，连出的是恶名、捞的是暴利也被视为“价值显示”或“业绩判定”。这就叫有害了。

希望文艺成为社会的圣品、重品、必需品，这当然是一种很不现实的奢望，而且还可能有“假道学”之嫌。但是使装饰品尽量少些，或是使装饰品强化一点于社会有益的基本功能，这样的要求应当说是不过分的。

失败的蹶叔

乐说

□陆春祥

如何算成功，如何算失败，其实并没有定论。但刘基《郁离子》中《蹶叔三悔》故事中那个叫蹶叔的人，其一生经历其实是很失败的。失败也没有什么，不可能人人都成功的，但蹶叔的失败却很有点意思。

此蹶叔向来自信，这么说吧，别人的话他基本听不进，他要认定什么，你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他的人生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家里务工做农民。民以食为天，他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他的行动和别的农民不太一样。他们家吧，分到的地倒不是太好，在龟山的阴面，一般说来，这样的地方，更要用心思才能种得好粮食。他却将水稻种在旱地上，将高粱种在湿地中。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水稻要水，高粱性旱，他却偏要像袁隆平那样搞科学试验，人家袁大师是真正的科学家，而蹶叔肯定不是。邻居经常劝他改变一下方法，可他就是不听。这样坚持的结果可想而知，种了十来年，他家的粮仓依旧空空，一顿接不着一顿。看着人家粮满仓，年年收成都不错，他于是醒悟：我后悔了，我一定要改掉自信的毛病！

于是，蹶叔进入第二个创业阶段，他去做生意了。从务农到经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型。一般的人要实现这样的转型都是很难的，更不要说个性鲜明的蹶叔了。果真，他依然老方一帖，还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套路来行动。他看到哪种货好卖，就赶紧进货，而且常常和别人抢购，不管价格是不是高，一律收进再说，等到他的货物屯积到很多时，那些同样也收购到紧俏货的生意人都挤到他这个市场上，可想而知，价格马上跌下，他不仅没赚到钱，而且常常货卖不出去。这个时候，好心的朋友都看不下去，告诉他一个简单的道理：会做买卖的人，常买进人家所不急于买的货物，瞄准时机再出手，这样才会有钱赚，你不能这样跟风的！蹶叔还是不听。这样一直做了10年买卖，还是异常穷困。这个时候，他忽然又有所醒悟，对朋友说：我已经吃尽苦头了，从此以后，我一定要接受你们的忠告，再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了。

估计此蹶叔前二十年的奋斗并没有什么成就，估计他也并没有娶妻生子，没有太多的负担，他想，自己做农民不成功，做商人也不成功，还不如换种方式，搞点新鲜的，说不定会一举成名的。忽然，他做出人生中的另一个重大决定：要去航海。于是蹶叔进入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阶段，做航海家。此蹶叔，失败归失败，还是很有人缘的，他还借得到钱租得到船邀得到朋友。于是一行人泛海东行，接近深海地带时，朋友相劝，不能再前进了，如果再前进，就会到海中的无底之谷，出不来的。蹶叔不听，没事没事，我们的船很安全的。不想，果真如他朋友所言，他的船进入到深海地带，漂啊漂，一直在海上漂了9年才回到岸上，是怎么回来的呢？还是一次强烈的台风，顺风把他的船吹上来的。

回到岸上的蹶叔，又是一副怎样的形象呢？头发尽白，形如干尸，没有人认识他了。这个时候，他彻底地懊悔了，对着朋友抱拳，向着太阳发誓：我如果再不听你们劝，一定不得好死！朋友们都笑了：悔就悔吧，但那些逝去的光阴还能再追回来吗？

诚意伯显然是夸张，此蹶叔本来就是个虚拟的人，虚拟了就没有多少真实性可言，至少航海的过程有点夸张。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言外之义的理解。蹶叔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呢？当然主要是性格，他就认一个理，自己很正确，而不管别人是如何做的。自己做自己的主总可以吧，我只要种子选好，施足肥料，再加上我的勤奋，不会没有收成的；人家卖得好，我也跟进，这肯定没有错的，做生意不卖紧俏的东西还卖什么呢？然而，别人成功的种种客观现实，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反证了他理念和行动的荒唐性。

生活中真正像蹶叔这么死不改悔的，肯定不多，但具有他一样做人做事思维的，肯定不少。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到死了还不肯改悔，我认为这比蹶叔要好，因为他从来不后悔，也就没有什么忧虑可言了。

望乡

□薛 峰

新加坡的张先生最终还是决定将辛苦半生的收藏全部处理掉。张先生一辈子忙着开工厂搞实业，把生意做遍几乎整个东南亚，老来孑然一身，守着偌大家业发愁，茫然回顾，才发现把什么都错过了。他告诉我此生只留下两宗遗憾：一是念了十几所英属学校，却永远念不好自己的中文名字；还有就是父母早亡，没来得及告诉自己到底是广东哪里人，空有一腔怀乡情思，却不知要怀念哪里，自己如同被故土遗忘的弃儿，到闭眼睛那天也不知道首丘何处。

他几次打电话来拜托我要给那些藏品找一个好归宿，并嘱咐我挑选一件作为纪念，我说这样就会坏了规矩，来来回回推辞了好几次。老先生说这是帮他圆一个还乡旧梦，这个梦，已经孤单清冷地做了千百回。我在电话这头心里一阵黯然，便不再坚持，选了一张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

拍照片的人叫胡崇贤，是蒋介石的御用摄影师。他1938年进入“励志社”，主要负责拍摄蒋介石、宋美龄和军政机关活动的照片，直到蒋介石辞世，故此得了个“胡照相”的雅号。照片拍摄时间是1949年4月间，正值解放军渡江攻克南京，蒋氏父子蛰居故里。莺飞草长、杂花纵横的江南风物装点着两个男人凝望奉化溪口老家的背影，看不到他们的表情，却透射出一丝莫名的凄惶。蒋家两代人都不失果敢温文，却总是少了一股豪纵霸气。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动了利益集团的根本，连累老子不得不暂时下野来挽回局面。这是他们离开大陆前最后一次告别奉化老家，收拾河山的旧梦犹在，却也抵挡不住片刻凝望中的脉脉乡愁。生于斯、长于斯、游于斯，从此都化作午夜梦回的一袭惆怅，旧家门巷、父母宗祠，对于这对父子而言，成了永久的奢望。

明朝人王季重曾在西陵渡口的空阔沙埂上，建造了两座亭子，一名“锦还”，一名“生还”。他自己说，建造此二亭是为了让倦游归来的人有片刻栖息之所，不论是求得功名富贵衣锦还乡，还是人海沉浮拖回半条残命，游鱼入海、倦鸟归林，故乡对于游子，都如同慈母亲手铺就的一张温床。“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是乐天派诗人的洒脱豪情，而且这种豪情只有在迷醉之后才能脱口而出。对于一般远宦游子来说，近乡情更怯才是真正的尴尬，因为自己无数次梦回的一方故土，早已面目全非，甚至已没有属于自己的故家，更没有故人。在外漂泊久了，渐渐地把他乡当成了故乡，真正的故乡，也渐渐地把无数人丢弃。

传说中，每个人魂归那世之后，都会在一个名叫“望乡台”的地方遥望自己的故乡。这是冥冥之中的有司给芸芸众生安排的最具情味的告别仪式。幽冥之事，或有或无，我不敢妄加论断，却深信冥冥中有那么一方“望乡台”存在。因为故乡对于有些人来说，生，也难回，死，也难归，剩下的，只有最后一望。

最初的文学记忆

□黄桂元

一些中外作家在追述文学启蒙之路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自己的母亲、祖母或外婆，在懵懂无知的孩提时代，是母亲或祖母用童话或歌谣浇灌了他们的文学心芽。

高尔基的外婆就曾为文学史家们所津津乐道。这位大文豪从小就遭遇了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的厄运，此后外婆便成了他的守护神和“最贴心的朋友”。外婆常常用动听的歌声驱走高尔基的孤独和忧愁，她朗诵天之骄子阿列克塞和武士伊万的诗歌，还讲述瓦西丽莎的经历和公羊神甫与上帝教子的故事，以及女寨主玛玛弗、强盗头子乌斯塔婆婆、埃及有罪女人玛丽娅的童话，并告诉外孙“圣母”如何遍访人间救苦救难，高尔基在自传体小说《童年》中清晰、完整地记述了外婆唱的一首歌，讲的是关于伊凡柯勇士和米罗那隐士的“美妙故事”，此故事非常珍贵，在任何书籍中都没有记载。高尔基识字后，便产生了把这些诗歌记录下来的冲动，可以说，外婆是他早期文学写作的“催生婆”。

最初的文学记忆，往往有着思想启蒙或艺术早育的意义，对于某一类作家或学者的一生写作走向的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哲学家刘小枫的精神成长期正逢一个文化饥馑的年代，所幸他遇到了一部具有“记忆里程碑”价值的重要作品。许多年后，刘小枫在《记忆冬妮娅》一文中回忆，八九岁时，他已经不再满足看关于保尔·柯察金的连环画，而是躲在被窝里痴迷地阅读繁体字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知不觉中，他对冬妮娅的“喜欢”超过了英雄保尔，并且承认那种“喜欢”与某种儿童暗恋无异。他当时百思不解的是，保尔何以对深爱自己、自己也同样深爱着的纯洁姑娘冬妮娅如此强调：“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刘小枫设想，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是保尔没有参加革命活动，他就会与“资产阶级的女儿”冬妮娅订婚成亲，那将会是另一种结局的故事。许多年后，刘小枫终于发出追问：“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爱情）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目的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妮娅为此感到羞愧？”或许正是最初的文学记忆，才促发了日后刘小枫更深邃、更彻底、更独树一帜的哲学思考。

另一些作家或学者的早期文学记忆，更多的是表现为异于常人的天资，也往往体现为某种文学引领作用。比如早慧的田晓菲，她的文学记忆应始于最初读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1976年夏秋时节。那年她只有5岁，偶尔会被父亲领到天津市文化局创评室一起上班。我当时退伍后刚刚被分配到那里工作。我清楚记得，一双小女童的手捧着那部砖头厚的作品，看上去实在有些吃力，但她那副把一切置之度外的埋头读书的神情却令人惊异，而且一读就是一两个小时，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周围的大人们难以置信，都不认为这个小女童会认识太多的字，更不相信她把书读进去了。于是大家围着她问，书里都写了什么。田晓菲便一脸稚气地作答，说出自己读到的内容，居然与书中的故事大体不差，这件事一时在我们单位传为奇谈。田晓菲9岁出版第一本诗集，14岁破格入北大读书，20岁在美国获文学硕士，27岁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她的文学记忆具备了挑战某项吉尼斯纪录的可能性。

我的精神成长期几乎始于一片文化荒漠。如果硬要追寻，我会想到儿时铭记的一首歌词：**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歌声是从幼儿园的琴房方向飘出来的，朦胧而悠远。我当时也就是四五岁，这首歌在我幼时的记忆里袅袅飘荡，那里面有景色，有人物，有时间，有情节，有朴素的爱憎立场，充满了悲喜莫名的遐想，曾经相伴了我的一段精神岁月。如今，歌词内容已在心中淡化，旋律却与我的记忆永在。

说到文学记忆，我想到了如今正在成长发育中的孩子们。我的女儿不足三岁半，混沌初开，满脑子是清一色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商业渗透力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风靡的“米老鼠与唐老鸭”，还日益扩展到大人的生活空间。这些孩子看上去悠哉乐哉，一派天真。可我也会想，触发这一代人最初的艺术情思的记忆会是什么？有关文学记忆的故事，会不会仅仅成为迂腐的历史传说？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

星河

XINGHE

上发条，别上套

□韩 松

最近科幻在中国似乎一帆风顺，热火朝天，发条紧起来，活动搞起来，一大批书出版，一大批仪式举办，一大批奖项颁发，原本只是民间草根的，但惹人眼热的是，政府和企业也掺合了进来。比如前段时间，郑州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投巨资建设郑州科幻主题公园，以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其实现在全国有好些已建或在建的科幻主题公园了，分布在泰安、芜湖、重庆、深圳等地，均由同一个公司的企业承建。重庆的那个公园投资就达两亿元。在中国，科幻已经这么值钱了吗？但也有人说这些科幻公园的主题都很烂，不过是弄几个恐龙吊着，再装几把激光枪，骗小孩来玩。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文化成果。号称拥有科幻动物长白山水怪的吉林省也行动了起来，为了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强化吉林省科学普及工作，繁荣该省科普作品创作，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特别是培养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自觉性，众多文化机构联合组织科幻类科普小说征集活动。哦，在这儿，科幻又一次要蓬勃发展了，仿佛置于一道流水线上，要进行集体化的组装生产，太好了！

这也仿佛是为了与好莱坞对抗。至少我们也得搞出一部《阿凡达》来吧？狂揽钞票和人心，还是一项文化政绩呢。中国都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怎么做不到呢？如果房市不行了，靠科幻能不能拉动GDP至少一个百分点？于是各级领导纷纷穿上正装擦亮皮鞋前往观摩《阿凡达》，还未消化，《盗梦空间》又把人震撼了。这部电影很“高级”啊——我观影时，旁边一位女观众说，这比《唐山大地震》高级！有些人听后民族自尊心又会受不了了吧？这个“高级”，我想大概是指它纠缠了这一切：如瑰丽、尖锐、复杂、微妙、黑暗、想象力、欲望、性爱、哲学、心理学、犯罪学、成功学……最后直达人类意识的深渊等等。这种高级电影用不着小刚式或艺谋式的催泪弹就能征服人，因为它是智力的、思想的入侵，大脑里面风暴大作，却要不战而胜。这很有颠覆性。一个小小的想法会迅速扩张，成长为一个全新的世界，太可怕了。潜意识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很危险了，要引起警惕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就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去颠覆一下西方呢？中国电影模式如此下去怎么能有说服力？于是中国电影界的有志之士们最近也纷纷染指科幻。总之像有人所说，科幻这块蛋糕，越来越多的人举起刀子了，暂时没举刀子的，也总不时地瞟上两眼。

这大概就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前途吧，言行是多么的让人钦佩！《工人日报》曾发表科幻作家魏雅华《中国孩子想象力倒数第一 科幻意识亟待培养》的檄文，痛心疾首地说，据新华网报道，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在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所以，我们要呼吁大力发展科幻，以此挽救民族的未来！

我当然赞同魏老师，但同时保持谨慎乐观，科幻还是有点儿自知之明才好。一亩三分自留地，农民一样辛辛苦苦地干活，按季节来吧。该种什么种什么，该收什么收什么，但千万别以为就能拯救谁。科幻自上世纪初被大贤介绍到中国，就被用来拯救民族，但百年过去了，谁拯救民族了？王晋康写的倒是高级科幻，但他是当年因为要给儿子讲故事，才“编”的科幻，怕是没想那么多道理，结果反而写成了大家。科幻要上发条，要“高级”起来，但不要给它上套，那样就没乐趣了。实际上，它还需要解套，科幻的精神是什么？是自由。科幻要做的，是缓解自己跟自己的紧张关系，在目前环境下，我有时倒更希望看到它偷偷地躲在一边儿找乐。

何时能再续优雅

□逄金一

晋代的陶渊明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此中之真意，“欲辨已忘言”。忘言也是一件优雅的事儿，而现在怕是不行了。“结庐”就是盖房子，那得有好多证件才行，要盖好几个大红的章才可以。而且，陶先生的“庐”估计和诸葛孔明的草庐一样，哪能入现代人之高级法眼，看某某名山大川边上，所盖的不都是豪华别墅嘛！那才是现代人的口味。

而且，现代人见南山，也不会是悠然的目光，更可能是贪婪的目光居多，一定会想这山里的野味如何、矿产如何、有无开采利用价值。即使没有煤矿金矿，那满山的石头也定有个名堂吧！再退一步，即使石头也平凡，盖房子总可以吧，于是南山至少要被挖走一半支援现代人盖别墅。

若在唐代，我们可以和孟浩然一起“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并且约定：“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赏心悦目的乐事不断，何其优雅。而现在呢？我们很可能是伐掉桑麻，盖楼！楼者，搂也，大包大包地搂钱啊。现在的时代，什么最火，不就是房市楼市吗？一楼在手，吃遍全球都不愁，至于菊花啊什么的，可有可无，现时代谁有钱谁就是大爷，没听过谁有菊花桑麻谁就是大爷的道理。

宋代的苏东坡是一个真正的“闲人”：“**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而现在，还有这样的闲人吗？我看这个时代更多的是忙人：忙着上网偷菜，忙微博，忙炒股，忙赚钱，忙加班，忙应酬，忙开会，忙着照顾孩子。闲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浪费时间，现在要的是追赶速度。于是我们每天像追赶野兔子一样追赶我们的生活，追赶我们的未来。所以现代人累啊，好多心理病与社会病也就出现了。不止如此，苏东坡之乐是回到自然，我们的乐趣呢？大约只是上网，或者去KTV罢了。东坡是心乐，我们是娱乐；东坡优雅，我们忙乱疲乏。

同样，若在明代，我们可以像张岱那样，去湖心亭看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余拏一小船，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现在还有这样的“人痴”吗？我看我们更多的是“人精”，一个比一个精，这种精不只是“精神”的精，更是“精明”的精，以尔虞我诈为目标与指向，把人生看似商场，将生活视为逐利之途，把赚钱当做人生主旋律。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即使是看雪吧，这行当估计也全是“产业化”，至少是商业化了，得几十元几百元地消费，无论乘船、暖气（不会给你生炉子的）、酒菜，不割人几两肉商家是不愿意干的。“优雅”在这儿的解释为：忽悠你，甚至让你大牙也榨干掉尽。

真的不知道，我们能够何时再续优雅。